

非洲“政治社会”的能动性

——《非洲起义：民众抗议与政治变革》述评

孟子祺

内容提要：在近年来抗议活动席卷非洲大陆的背景下，《非洲起义：民众抗议与政治变革》一书超越传统西方主流研究范式，提出以“非洲中心视角”来研究世界政治中普遍存在的民众抗议与社会政治变革问题，把学界通常认为不可能出现“现代政治抗议”而不被重视的非洲作为主要观察对象，深刻剖析了非洲近年来日益增多的民众抗议现象，并且提出了在全球财富鸿沟和信息鸿沟持续加深的趋势下，如何推动社会政治变革的问题。作者回顾了历史上非洲的抗议浪潮，梳理出一条新的“人民抗争”的线索，为理解非洲政治现代化的曲折发展轨迹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基于对非洲政治经验的梳理和反思，作者提出，非洲的思想和实践案例为解决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推广以来各国政治普遍面临的“代表性不足”的全球危机，开启了新的想象空间。

关键词：非洲中心视角 政治社会 民众抗议 政治变革

2000年5月13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称非洲为“绝望的大陆”（the hopeless continent），2011年12月3日，改称之为“崛起的非洲”（Africa rising），2013年3月2日，再称之为“雄心勃勃的非洲”（aspiring Africa）。对非洲崛起持乐观主义的观察家们，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随着经济发展而迅速扩大的非洲中产阶级上，却漠视了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底层民众。非洲底层民众有哪些政治和经济诉求？他们对未来非洲的愿景是什么？唯有深入了解广大非洲民众所处的

孟子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社会现实,才能够去理解近年来非洲激增的抗议活动。

在有关近十年来的全球抗议浪潮的研究中,非洲也基本上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鉴于非洲在西方中心视角下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叙事中长期被边缘化,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无论是“绝望的大陆”还是“雄心勃勃的非洲”,这些描述都将非洲放在被观察、被治理和被援助、拯救的位置上。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言,从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冷战和非殖民化时期、再到21世纪全球化时期,国际关系的实践和理论均呈现出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模式,非西方国家行为体、特别是被视作“野蛮社会”的殖民地的声音和历史被忽视或被边缘化;尽管在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后,依次独立的边缘国家被逐步纳入到国际关系的关注范围内,但研究者主要还是从中心国家的视角出发,基于大国竞争和操纵第三国的棱镜来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事件。¹ 由此不难理解,乡村的、保守的、“部落主义”²的非洲为什么被认为不会出现“现代政治抗议”。所以,除了北非地区被认定发生了革命性的“阿拉伯之春”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抗议活动通常被国际媒体粗暴地报道为“骚乱”“暴动”,或者被完全无视。

然而,随着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差距明显缩小、文化权威的分布更为分散³,源于19世纪的中心/边缘概念正逐渐被侵蚀乃至瓦解殆尽。因此,阿查亚和布赞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概念,呼吁国际关系学界关注深度多元化的后西方世界秩序,即2008年后出现的“1.2版全球国际社会”⁴,这一主张在非洲研究领域集中体现在有关非洲能动性(African Agency)⁵的研究增多。尽管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将非洲视为大国博弈中被动行为体的惯性思维仍旧存在,但非西方国家的声音、思想和实践正在引起全球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今天非洲的抗议浪潮已经席卷整个大陆,其规模之大、频率之高,使人无法再对其视而不见。据统计,仅2005年至2014年间,40多个非洲国家就发生了近百起民众抗议

1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3-5.

2 部落主义即“tribalism”,是对于非洲人注重集体、族群传统深厚的一种概括,常用来解释非洲出现的冲突现象。参见刘海方:《十周年后再析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第35页。

3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99.

4 根据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的分类:“1.0版全球国际社会”是指19世纪至1945年的国际社会,“1.1版全球国际社会”指1945年至2008年的国际社会,“1.2版全球国际社会”即2008年后的国际社会。参见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4.

5 刘海方:《非洲重回世界中心还是大国在非洲博弈?——从全球对非峰会外交说起》,《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年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145页。

活动¹，非洲城市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希望从根本上改变非洲国家内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这些抗议活动在有望开启新的政治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自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非洲民众的抗议活动快速增加？抗议活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抗议民众当中以哪些群体为主？如此多的民众抗议活动是否已经推动非洲国家层面的实际变革？民众抗议活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有效的政治运动，推动革新并使国内政治向更加良善的方向转型？

这些问题对于理解非洲正在发生的变革十分重要。但长期以来，囿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视角，学术界鲜有研究专门聚焦于非洲民众抗议这一主题。直到2015年，亚当·布兰奇(Adam Branch)和撒迦利亚·曼皮利(Zachariah Mampilly)合著的《非洲起义：民众抗议与政治变革》(*Africa Uprising: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hange*)一书横空出世，为理解非洲民众抗议的历史、内容和理论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布兰奇目前担任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曼皮利为纽约市立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两人长期从事非洲研究。在本书研究写作阶段，二人分别执教于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Makerere University)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该书摒弃了近年来大行其道的“非洲崛起”论调，在作者看来，这一论调是基于西方中心视角，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城市中产阶级成为推动全球变革和进步的主要力量；作者立足非洲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本身，研究考察了非洲大陆上更为重要的变更动力——公民抗议现象，具体分析抗议的具体内容、动因和影响。

一、“非洲起义”：殖民时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变革传统

《非洲起义》一书共有八章，第一章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定位了非洲的抗议活动，为读者提供了非洲政治变革传统的鲜明由来。从空间维度来看，布兰奇和曼皮利着重突出了非洲的“整体性”这一前提，否定了传统二分法，即将北非地区排除在所谓“真正的”非洲之外的常规做法。两位作者认为，北非各地发生的抗议事件与整个非洲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抗议事件有重要的相似性；2010—2011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抗议活动，虽被归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但它们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抗议活动并没有明显差别，反而证明长期以来整个非洲的民众抗议有着持续不断的活力和相互关联性。从时间维度看，该书作者将非洲的抗议浪潮置于抗议政治的历史之河中观察，并将非洲抗议历史归纳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

1 Adam Branch and Zachariah Mampilly, *Africa Uprising: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Zed Books, 2015, pp.70-71.

反殖民主义抗议活动，其高潮是非洲殖民统治的终结；第二次浪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代表性成果是许多一党制国家和军事独裁国家政权的瓦解，多党制民主国家在非洲广泛建立；第三次浪潮当下正在发生，结果还有待观察。

接下来三章分别介绍了非洲大陆的三次抗议浪潮，围绕“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在民众抗议中的角色展开分析。“政治社会”这一概念作者借鉴自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帕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著作，但为其赋予的内涵与查特吉的定义有所差别。查特吉将“政治社会”与政府形式的权力联系起来，¹而该书则用“政治社会”指代非洲城市中由经济上最贫困的人群组成的底层社会，例如失业者、非法就业者、非正式工人等。1948年“阿克拉骚乱”²(Accra riots)标志着“政治社会”开始成为非洲抗议活动的核心角色，城市成为未来非洲斗争的中心。纵观自“阿克拉骚乱”以来非洲的抗议历史，城市底层民众这一群体在三次抗议浪潮中均处于中心地位。

第一次抗议浪潮发生在非洲非殖民化进程的背景下。加纳政治家、革命家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法国思想家、革命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对“政治社会”在抗议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持截然不同的看法。恩克鲁玛认为，需要将城市民众抗议纳入到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运动中，民族主义政党将“政治社会”、工人阶级、农民等不同的社会团体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独立斗争来实现变革；法农认为，城市民众抗议必须处于民族独立斗争的核心，唯有如此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政党精英领导下的民族独立很可能是新殖民主义。被法农称为“游民无产阶级”³(lumpenproletariat)的“政治社会”是自发且激进的城市起义的先锋，其目标不是有限的改革，而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推翻整个殖民制度。在这一阶段，城市民众抗议在实践中大多遵循了恩克鲁玛的设想，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恩克鲁玛在加纳进行的“积极行动”(Positive Action)运动。

第二次抗议浪潮始于贝宁，起因是城市底层民众反对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

1 Adam Branch and Zachariah Mampilly, *Africa Uprising: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hange*, p.199.

2 “阿克拉骚乱”始于1948年2月28日英国殖民当局屠杀加纳退伍军人事件。当日，二战期间在英国军队服役的数百名退伍军人组织街头抗议游行，要求英国殖民当局实现其在战前保证复员军人的生活和工作的诺言。英国殖民当局当场开枪打死三人，打伤数人。在随后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游行中，殖民军警再次打死数十人，打伤数百人。英国殖民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加纳全国的愤怒，民众上街洗劫英国人的商店、袭击警察署和监狱、持续不断地游行示威，抗议活动持续超过一个月。这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民众抗议并非是一个偶然、孤立的事件；加纳民众走上街头不仅是出于对英国殖民当局向加纳退伍军人施加暴行的愤怒，更是由于对快速城市化的无所适从，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与高失业率的不满，以及对长期压迫性殖民统治的怨怼。“阿克拉骚乱”被非洲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塞利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 L. R James)称为“点燃加纳革命的火种”。

3 Adam Branch and Zachariah Mampilly, *Africa Uprising: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hange*, p.27.

案。紧缩政策加剧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困境,“政治社会”因而成为此次抗议浪潮的关键群体。表面上看,各种利益集团在街头联合起来进行抗议,事实却是“政治社会”被利己主义精英所利用。“政治社会”寻求的是广泛的根本性政治变革,但动员民众走上街头的反对党却旨在利用民众抗议迫使国家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多党制,从而使自己能够以竞争者的身份参与选举。工人、学生和非政府组织则致力于与政党结盟,重新获得在发展型国家中享有的特权地位。总而言之,政治精英利用“政治社会”对政府施压后,便对其诉求置之不理了。

第三次抗议浪潮于21世纪初缓慢兴起,在2011年达到顶峰并持续到现在。非洲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了经济萎缩、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城市贫困人口——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千禧一代”,由于失业或非正式就业被迫拥有很多“自由”时间并陷入长时间的等待。¹面对这些问题,第二次非洲抗议浪潮后出现的多党制政权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却无能为力。在这一背景下,非洲民众有意寻求新一轮更深刻和更广泛的变革,由此产生了第三次抗议浪潮。2014年,布基纳法索总统决定通过由其亲信控制的议会修改宪法,从而引发民众的抗议活动,成为了此次抗议浪潮的起点。

在第五至八章中,该书选取了第三次非洲抗议浪潮中的四次抗议活动进行案例研究,其中有2012年“占领尼日利亚”运动、2011年乌干达“步行上班”抗议活动、2005年埃塞俄比亚的城市起义和2013年开始的苏丹“我们受够了”(Girifna)运动。作者具体分析了四个案例中每个抗议活动是如何出现的、抗议者的主要诉求、抗议如何受到社会内部分裂的限制,以及抗议活动结束的方式。这些案例显示,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和反对党是可以联合起来进行抗议活动的,但结果也表明,这种联盟是非常脆弱和复杂的。此外,这四场抗议活动似乎都没有使本国发生根本性改变,对如何评价这些抗议活动,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非洲的民众抗议活动存在历史连续性,这种历史连续性源自于殖民统治时期以来,非洲持续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政治社会”是该结构中的核心概念。

二、历史连续性:“政治社会”的“起义”

基于对非洲三次抗议浪潮的历史考察,布兰奇和曼皮利提出的主要论点是:非洲的民众抗议活动存在历史连续性,这种历史连续性源自于殖民统治时期以来,非洲持续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政治社会”是该结构中的核心概念。

非洲“政治社会”的出现源于殖民统治者强加的城乡隔

1 Ato Quayson, *Oxford Street, Accra: City Life and the Itineraries of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45-246.

离政策：非洲城市为欧洲殖民者所独享，他们拥有公民身份，享有由殖民当局保障的属于“公民社会”的政治权利；农村才是非洲人的生活场所，在这里，酋长拥有习俗权威（customary authority），殖民当局通过操纵酋长实现对农村的控制。然而，发展殖民经济需要非洲人在城市进行工作，因此带动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尽管殖民当局有严厉的措施限制人口流动，城市人口的增长还是很快超过了城市基础设施可承受的范围。除了极小一部分非洲人成为从事合法工作的永久性城市居民外，绝大多数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只能选择非正式的，甚至是非法的就业。这些城市底层民众被贬为“臣民”（subjects），不享有任何公民权利，更得不到正式的法律或政治保护，随时可能遭受殖民警察以安全、卫生或发展为名的暴力对待或驱逐。城市底层阶级虽然人在城市，却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殖民当局认为是行动难以预测和琢磨的，他们的居住地——不断扩大的贫民窟和棚户区——更成为殖民当局不断焦虑的根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阶级分化在殖民地国家中逐渐被固化，即使在独立之后仍然延续下来，成为现代非洲国家的问题。

“政治社会”概念的理论化，挑战了过往关于民众抗议和社会运动研究中广泛借鉴的“公民社会”模式。前人的研究往往认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居于全球抗议浪潮的中心地位，这一认知主要来自于西方的经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简明扼要地指出，一场全球“中产阶级革命”正在发生：在土耳其和巴西，就像之前在突尼斯和埃及一样，政治抗议不是由穷人领导的，而是由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年轻人领导的。¹然而，非洲发展型国家的“公民社会”与西方模式有根本性差异。第一，西方的“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府、相对自由的政治和经济空间；而非洲的“公民社会”主要由享有相对特权的城市人口组成，他们与政府联系紧密，享有正式的、法律上或政治上有保障的资源和利益分配。第二，尽管随着“非洲崛起”，非洲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增，但其规模相较于总人口仍然很小，且地位脆弱。在政府官僚机构和半官方机构提供的稳定工作有限的情况下，为维持自身地位，非洲的中产阶级纷纷涌向国际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工作。这些组织大多依靠外国资助运作，由它们引领的反腐败等抗议活动往往是外国干预非洲国家内政的一个幌子。所以说，非洲和西方社会不同，不能指望刚起步的中产阶级推进国家的民主改革。

政治行动的形式取决于政治身份，政治身份则由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来定义。“公民社会”中的精英、学生、公务员和正式工人可以获得国家法律对其权利的保障，农村人口受到酋长政治权威的制约。不同于这两类人群，构成“政治

1 Adam Branch and Zachariah Mampilly, *Africa Uprising: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hange*, p.186. 该书关于“中产阶级革命”的论述来自 Francis Fukuyama, “The Middle-Class Revolu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8,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3873904578571472700348086>, 2021-05-18.

社会”的城市底层民众与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法律或政治关系,不接受国家机构及法律渠道的调解。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公民社会”一般采取非暴力集体行动表达自身诉求;而“政治社会”直接与国家政治精英叫板,以走上街头与当权者进行临时的、非正式的、个人化的谈判的方式,来表达改善生存条件的诉求。由于没有正规渠道,“政治社会”通常诉诸于极端且激进的行为,以引起政府和社会其他阶层民众的关注。这样的行动策略往往会招致警察的暴力镇压,从而使抗议演变为暴力形式。

直至今日,民众与警察的暴力对峙仍然是非洲“政治社会”抗议活动的突出特征。持续近三年(2017—2020年)的“反西非法郎”运动(法语: Mobilisation Anti-Franc CFA)几乎在所有非洲法语国家都掀起了示威游行浪潮。运动领袖凯米·塞巴(Kémi Séba)于2017年8月在塞内加尔的反西非法郎集会上,当众焚烧5000面值的西非法郎(约合9.2美元),多名人员在混乱的现场被捕,集会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点燃了非洲籍和非洲裔青年愤怒的反法的火药桶。虽然当天逃过警察的抓捕,但在事发后不到10天,凯米·塞巴在遭到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起诉后被捕,继而因“对公共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被判驱逐出境。在2020年10月尼日利亚全国性的“终结 SARS”运动(End Special Anti-Robbery Squad)¹中,警察使用催泪弹、水炮、子弹等驱散抗议者,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根据现场抗议者证实与媒体报道:10月20日,尼日利亚军方在抗议最激烈的拉各斯市莱基区射杀抗议者致至少12人死亡。²这一新闻虽遭到尼军方否认,但无疑是在民众愤怒的情绪上火上浇油。

非洲的抗议经验表明,“公民社会”模式和全球中产阶级起义的叙述模式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它掩盖了更贫穷和更边缘化的阶层在当今全球抗议浪潮中的真正参与。“政治社会”有着悠久的抗议和斗争历史,在非洲长期盛行的“政治社会”抗议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不应继续被淹没在传统的叙事之下。

三、第三波非洲抗议浪潮:青年的“等待”与政治变革

尽管非洲的抗议历史能够通过“政治社会”这一行动主体贯穿起来,但作者同时也强调,抗议活动发生在错综复杂、充满对立和矛盾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中,很多抗议活动虽都带有反殖民主义色彩,但也并不存在某种统一的反殖民主义精

1 “SARS”是尼日利亚“反抢劫特别行动队”的英文简称,全称是“Special Anti-Robbery Squad”。第一次“终结 SARS”抗议活动发生在2017年,但抗议活动发生后,尼日利亚政府并未解散反抢劫特别行动队,仅下令其进行改组。尼日利亚政府对反抢劫特别行动队的纵容,为2020年第二次“终结 SARS”抗议活动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2 胡毓堃:《尼日利亚的“SARS病毒”:反警察暴力抗议背后难解的困境》,澎湃新闻,2020年10月27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730253, 2021年5月18日登录。

神。抗议的形式和意义可以多种多样,具体取决于抗议者的身份、诉求及与其他社会和政治团体的关系。即使是在“政治社会”内部,不同人群(青年人、非正式就业者、失业者、非法居住者)也有不同的关切、策略和目标,他们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张的政治关系。¹此外,各国选择的抗议形式不同导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非殖民化道路,从而也影响了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政治。

第三波非洲抗议浪潮中,“政治社会”中的青年人愈发成为抗议活动的主力。如今非洲大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年龄在24岁以下。然而,由于失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糟糕的社会治理和政治不稳定等因素,非洲青年普遍面临失业的困境,即使就业也大多为非正式的就业,因此,他们无法承担起成年人的社会角色,从而长期陷入“等待成年期”²(waithood)。随着非洲的青年人口不断增加,这一人群的机会空间持续收缩,越来越多的非洲青年成为“不稳定无产者”³(precarariat),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过渡,而是不断延长的、可能成为其一生的状态。当非洲青年开始相信克服“等待成年期”困境需要彻底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时,推动变革的潜力便应运而生。城市底层青年形成一股脱离传统政治框架的力量,他们独立于政党的政治庇护关系,也不在受保护的“公民社会”的框架中,即使和政党结盟,也只是为实现具体利益的临时结盟。

可惜的是,这股潜力很少能够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第三波非洲抗议浪潮中,除了导致城市空间的安全化和军事化,以及活动家和反对派政治家遭到镇压与限制外,几乎没有为发生抗议活动的国家带来任何明显的变革。按照“公民社会”模式来看,社会运动应该是有组织的、有纪律的和非暴力的,并且只有当按照抗议者的要求实现国家的具体改革时,抗议活动才可以被称作是成功的和有意义的。依照这一标准,往往无法实现目标、甚至目标本身就不明确的非洲抗议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意义。

不过,“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对政治变革的愿景本身就有着质的差异,采取抗议行为的驱动力和特征也并不相同。“公民社会”的政治愿景是改革主义的,着眼于促使国家进一步保障公民权和巩固“公民社会”的地位,有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领导,而驱动“政治社会”抗议的不是对政治改革所持有的具体设想,而是出于对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需求。他们遭到国家的暴力压制,在现有的政治

1 Adam Branch and Zachariah Mampilly, *Africa Uprising: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hange*, p.14.

2 阿尔辛达·翁瓦纳(Alcinda M. Honwana)使用“waithood”(waiting for adulthood)这一概念来描述非洲青年在有能力成为成年人之前,所经历的长时间的等待期。在这段时期,他们的身份既非受抚养的儿童,也不是真正的成年人。参见 Alcinda M. Honwana, *The Time of Youth: Work,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Africa*,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3 有关“不稳定无产者”的讨论参见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Micheal Curtin, and Kevin Sanson, *Precarious Creativity: Global Media, Local Labor*,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机构中代表性不足，他们改善自身生活境遇的需求迫切而激进。“政治社会”抗议寻求的目标是笼统而极端的，即颠覆现有的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看起来是不可预知的和破坏性的。并且，“政治社会”抗议又大多缺乏组织和领导，更多地呈现出自发性的特征，没有明确的替代性政治方案。如此导致几乎所有发生在非洲大陆的抗议活动都在国家暴力的打压下消散，抑或是在精英们的领导下陷入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暴力之中。这也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认为非洲的抗议活动并非“现代政治抗议”所持的一个主要批评观点。

非洲抗议活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对非洲社会的政治意识和想象力的影响。

的确，民众街头抗议大多并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行动，而是出于纯粹的愤怒和绝望。公共集会、示威游行、公开声明等抗议行为是一个释放愤怒和压力的阀门，走上街头的城市底层民众只知道自己对现状不满，但并不明确自己未来应如何安排。这样来看，无论抗议发生在哪个国家、由哪个群体主导、具体诉求如何，鉴于“政治社会”自身的属性特征，非洲的抗议活动几乎不可能在全社会掀起真正的政治变革。然而，衡量抗议活动成功与否不应该只看重于此。在尼日利亚政治学家克劳德·阿克（Claude Ake）的启发下，作者提出非洲抗议活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对非洲社会的政治意识和想象力的影响。¹ 在非洲，正式的民主化有时反而是独裁者为了讨好国际观众、通过表面的体制改变来转移民众抗议注意力的诡计。政治意识和政治想象力才是政治变革的必要前提和坚实基础。缺乏这两者的有力支撑，即使实现了民主化也不过是虚有其表。

四、网络运动：数字化时代下的抗议新趋势

《非洲起义》出版于2015年，书中对非洲抗议活动的统计截止到2014年，案例分析中最近的也发生在2013年。其后，得益于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交网络在非洲民众的抗议活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趋势随着非洲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和“政治社会”中青年比例的上升而日益显著。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油管（Youtube）等社交网络平台如今成为青年线上交流的主要场所。参与抗议活动的青年对社交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抗议开始前，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活动倡议和集会时间、地点等信息；抗议进行期间，通过网络直播或实时动态发布的方式，与关注者进行交流，激发旁观者的参与热情；抗议结束后，通过网络转发和分享使事件和不满情绪持续发酵。

¹ Adam Branch and Zachariah Mampilly, *Africa Uprising: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hange*, p.186, quoted from Claude Ak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6, p.135.

仍然以近期最具代表性的“反西非法郎”运动和“终结 SARS”运动为例,这两次抗议活动的主体都是青年。在“反西非法郎”运动中,领袖凯米·塞巴于2016年底在脸书平台上第一次动员有组织的国际抗议活动,并于2017年1月7日成功在多国召集了集会、示威或演讲,范围涉及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马里首都巴马科、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摩洛哥乌伊达市以及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等欧洲城市。抗议活动现场和活动家演讲的照片和视频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特别是凯米·塞巴当众点燃一张5000面值西非法郎的照片和视频引发了大量的网络转发和媒体报道,使得抗议活动获得了更多青年的支持,也吸引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关注,抗议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

分别发生在2017年和2020年的“终结 SARS”运动也离不开网络的助力。2017年,尼日利亚民众就在推特上发布带有“终结 SARS”标签(#ENDSARS)的推文,并推动其成为热门话题。2020年“终结 SARS”运动的导火索是一段“反抢劫特别行动队”(SARS)警察暴力执法的视频,视频中一名反抢劫特别行动队警察在尼日利亚德尔塔州的某酒店门口枪杀一名年轻小伙,该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推特上“终结 SARS”的话题标签重现,加速了该视频的热传并导致事件迅速发酵,最终引爆2020年10月8日全国性的抗议活动爆发。此次抗议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众多尼日利亚乃至国际知名人士的声援和支持,美国著名歌手蕾哈娜(Rihanna)就带着“终结 SARS”话题标签转发了此次抗议活动图片。

将社交网络作为抗议活动组织的平台也带来了一个附加效果,即抗议活动呈现出跨地域性的新特点。美国政治学家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提到:“游行不像罢工那样,需要利用某种关系来阻止劳动或扣留产品以吸引支持者,它可以迅速地从—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并联合许多社会参与者。”¹而社交网络的出现和流行便利并加速了这种联合,真正实现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反西非法郎”运动的集会不仅出现在西非和中非法郎区国家,更是跨出了非洲大陆,蔓延至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等二十多个欧洲国家。借助社交网络,示威者能够于同一日集合在各自的城市,遥相呼应,使社会运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结语：从非洲经验到全球实践

总体来看,《非洲起义》一书为非洲研究者提供了将非洲城市民众抗议概念化的理论框架,提醒读者以非洲中心视角关注非洲“政治社会”的能动性。非洲这块大陆是特殊的,同时又蕴藏着丰富的可能性,包括启发全球政治变革的可

1 [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能性。

近年来,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民众抗议运动也更多地展现出非洲“政治社会”“起义”的特点,例如法国“黄背心”运动(法语: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和起源于美国非洲裔社区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虽然参与者、发生地点和起因都不尽相同,但两场运动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却有相通之处。它们都运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或标签进行宣传和快速召集民众;均无特定的领袖、政党或工会领导,而是依托松散的去中心化组织架构;诉求也都不固定,或宽泛或时常出现变动。“黄背心”运动最初的导火索是法国政府上调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引发民众不满,后来抗议群体的诉求扩大至提高最低工资、取消紧缩政策、提升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提高政府透明度、要求总统马克龙下台等等。“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不仅限于抗议美国警察针对非洲裔族群的暴力执法,还包括抗议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对黑人的暴力和系统性歧视,关注黑人女性、黑人非法移民、黑人残疾人等黑人群体的诸多权利保护问题。这两场社会运动也不再是和平抗议,而是暴力示威:法国和美国街头警民对峙的画面,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商铺遭抢劫和打砸的场景,以及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周围的林肯纪念堂等建筑遭破坏的照片,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从“黄背心”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特点来看,可以说两者与非洲城市民众的抗议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场运动至今都仍在持续,只不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线下抗议处于暂停状态,抗议者的精力也被疫情分散。至于这两场运动目前取得的成果,相较于付出的代价,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作出的让步或改善可以说十分有限。

始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非洲抗议浪潮不会很快结束,即使发展过程有起有落,只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没有达成民众的要求,社会运动就不会消失。对此,以经济合作方式日益深入非洲广阔社会生活的中国各方行为体来说,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相应的功课。受西方中心话语体系影响,很多中国学人已经不再将亚非拉作为“国际视野”、而是“言必称美国”了,更不必说对于非洲“既不知情、也不关心”的青年一代学生!¹中国需要格外努力从“西方中心视角”转换为“非洲中心视角”来理解真实的非洲。

1 刘海方:《从创世史看全球非洲研究危机:中国范式及其出路》,《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4—136页。